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

唐宝林卷



兰州大学出版社

求真集

1200317149

50



1200317149

福州大学
图书馆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

求真集

K360.7
703



唐宝林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唐宝林卷:求真集/唐宝林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ISBN 7-311-02083-2

I. 当... II. 唐... III. ①社会科学一文集②唐宝林一文集③陈独秀(1880~1942)—人物研究一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090 号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唐宝林卷

求真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市残联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75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3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7-311-02083-2 全套定价:180.00 元
(共十册)

“丛书”总序

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克非先生对我说，要为六十岁以上、七十岁左右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出版一套人文社会科学论著自选集。其中，史学类要我帮忙编选十卷一辑。我想，这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八十岁上下的大学者，多有出版家为他们周密策划出书事宜。有的大学者的文集、文选不知重复出版了多少套，而六七十岁的少名或无名的“青年老头”却少有人来问津。说穿了是因为后者的著作不能为出版者赚钱，甚至还要蚀本。第二，是有官衔的“学者”，因为有权势在手，不管他有学问没学问，也有办法（例如用公款支付出版费用，甚至公然买书号）令出版社为自己出文集、文选。据我所知，某些“长”字号的此类书籍，就是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版的。即使没有人买没有人读，他们也会颀然送人，到处张扬。这两条理由，不知道克非先生是否认同，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兰州大学出版社的盛情，令我感动和钦佩，因而不辞自身学养之浅陋，当即答应为他们选荐作者。出版社的标准就是我的选荐标准：只问学问，不问官职；只选六十至七十岁之间或略大于

七十岁的学者。这时，我不由想起季羨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
的一段话：

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有很大不同的。科学技术专家，一到六七十岁退休的年龄，有的耳有点不聪，有的目有点不明，难以再进实验室，拿手术刀手也发颤，只好退而且休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家，则到了这样的年龄却是如日中天，正是读书写作的大好时候。即使耳目有点小毛病，甚至大毛病，也无大碍。此时，他们书读得越来越多了，知人论事的能力越来越强了，通古今之变的本领越来越高了，究天人之际的愿望越来越旺了，即使遵章退休，也往往是退而不休。

我完全赞同季老的高论，且有所补充。照我看，中国的六七十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大多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上坎坷多难，饱经风雨沧桑，不乏伤心切肤之痛。然而，他们从未颓唐不振，反而因为心灵深处拥有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独立思考 and 敢于重新评估一切的怀疑精神，使他们晚年生活追求中始终不曾忘却对人文社会科学尽自己一份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他们虽面对权威和虚假，却甘于清贫和寂寞，以信念、醒悟和批评，诉求真实，尊重歧异，鄙弃教条，质疑权威，敢于应对非学术因素干扰下学术领域的种种挑战。

我的专业是研究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史，所知只有一百多年的史事，而对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则知之甚少。不负所托，为了审慎地选荐丛书各卷作者，我便向这两个学科的专家和老朋友请教。世界史，我请教于苏俄史专家陈之骅先生；中国古代史，我请教于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之骅谦虚地说他自己的文章暂时没有时间整理，他诚恳地推荐英国史专家王章辉先生，王先生欣然俯允。春瑜除承诺自编一卷外，又热心推荐汉唐史专家张泽咸

先生、宋辽金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张、王两先生亦积极响应。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我敦请王桧林、张注洪、马连儒、唐宝林四位先生予以支持。桧林先生以主编《中国现代史》（高校教科书）、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抗日战争史而名满学界。注洪先生以研究中国现代史科学与信息学而著称。马连儒编审主持《人物》杂志多年，对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研究既深且精。唐宝林研究员近二十年间以研究陈独秀和托派历史知名于海内外。在以上八位先生的选荐过程中，我始终在寻找马大正先生。他是边疆史地和少数民族史专家，我虽不研究边疆史地，但一向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大正其时正在新疆考察，直到一个月后才联通敲定。

九位先生中，六位是旧雨，三位是新朋且从未见面。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汉、唐、宋、辽、金、明、清、民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和英国史诸学科。我稟性愚鲁，才疏学浅，对上述许多领域相当外行，不敢妄评诸公学术成果，但据平时涉猎，参照学界品评，我深信他们都是各自学科中的一流学者。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他们以其非凡的学术成果为本学科作出了独特的有些是无可替代的学术贡献。这种贡献的深层意义，在于他们摆脱了长期流行并主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二元思维定势”，即非好即坏、非美即丑、非善即恶的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人们可以见仁见智，乐山乐水，可以提出种种批评见解，但在学德和文品上，他们绝不会愧对广大读者，这就是：

——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是无所禁忌，秉笔直书，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

——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信史，是史镜，而非“胜利者的宣传”。

我坚信，这应当是时下和未来历史学主体和客体的正确的发

展方向。这也是高悬于我和所有作者面前的崇高的目标，追求之心不敢稍懈。

陈铁健

壬午谷雨後四日，京東亮馬河畔水南齋

自序：我的学术生涯

本人于 1959 年上海中学毕业，考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64 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大学），从事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到一年，就被卷入四清运动及以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丢掉”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1979 年，在祖国百废待兴的转折关头，我有幸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为了追回失去的岁月，只得放弃一切休闲、娱乐时间，像一个苦行僧，在史料、研究、撰述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春秋。

在这 38 年的政治运动和学术生涯中，我看到了太多的谎言和假话，看到了政治与人性的丑恶与残忍，往往感到无比气愤；同时也看到不少有良知而富有正义感的人们，为求真求实，为社会的进步、民主和自由，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歌可泣。谁说在和平年代无需流血牺牲呢！至此，我又常常热血沸腾，决心以他们为榜样，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唯其如此，我才能在学术研究中，不人云亦云，独立思考，作出了一些成绩，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厚爱与褒奖。

但是，人的成长毕竟是一个过程。在我的早期论著中，由于思

想的稚嫩或客观条件的限制,或受谎言假话的蒙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与不足(如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基本上是据于因袭的观念而经不起后来发掘的历史事实的检验),到后来认识到时,有一种羞愧之感。是陈独秀给了我处理这种尴尬的勇气和方法,这就是坚决而坦白地抛弃过去曾经十分坚持而已经被实践证明错误的观点,觉今是而昨非,光明磊落地阐明今天以为正确的观点。如果以后的实践证明今天的观点又错了,仍照此办理,与时俱进,做一个自己的“终身反对派”(陈独秀语)。为此,我在本书一些地方加了“2002年补注”。而80年代的三篇主要论文《旧案新考》、《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史料基本属实,但观点基本上是站在共产党立场上的传统观念,偏颇之处尚多,90年代末期以后才有所纠正。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其实,这样做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与人的认识发展的辩证法的,并不是耻辱。应该与那种为了投机而违心改变自己观点的现象区别开来。一位著述丰富而很著名的年长学者,在谈到他的代表作时,竟感慨地说:“过去的著作别提它了,都是极左的产物”。这位我十分尊敬的长者的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那些论著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是历史的纪录。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给读者某种知识,还在于让读者了解作者追求真理的过程,了解在这个过程中的艰难曲折和经验教训,同时也了解我们曾经历过怎样的年代,从而悟到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和它的复杂性。这一点也许比论著本身更有意义。

本着这个想法,我选编了这个集子,从中可以看到我的学术生涯从昨天走到今天的足迹,看到我追求真理的过程。所以,这本集子取名为《求真集》。下面交待一下几个主要课题的研究状况:

陈独秀问题:这是我一进入近代史研究所就重点研究的课题。没有想到后来由于主持陈独秀研究会及其会刊的工作,一发不可

收,成了我终身关注的目标。开始时,我如此顺利地进入这一后来取得较大成果的领域,首先要感激我的领路人史洛明大姐。战争年代,她从白区投奔延安,由于年纪小,生性活泼、豁达、乐于助人又爱打抱不平,那时就很出名。解放后,史大姐在某国家机关工作,文革中她和她一家人受到很大冲击,深感世态炎凉,文革后便要求到近代史所从事革命史研究工作。由于她也是安徽人,而且七拐八弯,与陈独秀家有某种亲戚关系,对陈独秀后期历史受那么多不白之冤,一直耿耿不平,但又说不清楚,总觉得有许多疑问,于是很想搞清楚。她见我去研究所后待定研究课题,就动员我与她一起搞陈独秀后期历史研究。那时的史学界,只看到共产国际和中央党的文件上说陈独秀后期被开除党籍,与托派相结合进行反党活动,是反革命、汉奸、叛徒。具体内容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甚至于他与托派究竟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托派?都有争论。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后期与托派关系最密切的时期(1929~1937)是处于地下工作状态,而且这一时期他与托派的活动与思想,全反映在托派内部印量很少的油印刊物、小册子和传单上。而这些材料早在1952年12月开始的全国大逮捕、资料大清理的肃托运动中,几乎全部被收缴,使后人难以进行客观的研究。于是,人们只能人云亦云,沿用1929年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和七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文革前中共党史标准本——胡乔木根据毛泽东旨意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的传统说法,把陈独秀说成“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托陈取消派”、“反党”、“反共产国际”、“汉奸”、“反革命”、“叛徒”。

1979~1981年,文革结束初期,形势还比较混乱。史大姐带着我到有关机关转了一圈,收集到有关陈独秀后期的大量资料,这

些资料(包括郑超麟 1945 年写的三大本《回忆录》未完成手稿、《陈独秀传》未完成草稿和有重大史料及学术价值的《陈独秀与〈甲寅〉杂志》)十分完整、系统地反映出陈独秀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到 1942 年去世时的思想和活动,以及中国托派从 1927 年诞生到 1952 年在大陆上覆灭的全过程。这时对于我们来说,犹如一个淘金者寻到了一个大富矿。虽然当时使用这些资料有许多限制,而且不久又封存了,再加上我们的时间及资金有限,我们只抄录复印了一部分,但已经足以让我们用这些资料,再配上其他资料,弄清陈独秀后期(1927~1942)的历史状况。

接着,我们为了让史学界同仁共享这些珍贵的资料,在李新同志的支持下,就发起组织安徽、北京、上海三地陈独秀问题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搞一部综合性的《陈独秀研究资料》,包括新发现的陈独秀论著、档案资料、别人对陈的回忆录、重要的评论等,按陈独秀的历史为线索,安徽的同志主编第一卷,1879~1915 年陈独秀早期的资料。当时他们发挥地方优势,已经发现了《江州陈氏义门宗谱》、迄今发现的陈独秀最早的著作《扬子江形势略论》、陈独秀早期主编的刊物《安徽俗语报》等珍贵资料。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志主编第二卷,1915~1920 年创办《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广东教育改革和筹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资料。当时他们已经收集到《广东群报》,上有 1920 年底到 1921 年 9 月陈独秀在广东活动的大量资料。上海的同志主编第三卷,1921~1927 年,从中共一大到大革命失败,当时他们已经查阅到陈独秀在五卅运动期间比较全面的资料,特别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时期党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的每次会议详细的原始记录。我们则利用上述陈独秀后期资料编辑第四卷,1927~1942 年。史料之真实、丰富和全面,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基础。当时我们设想,这套资料的出版,必将大大推动陈独秀研究事业的开展。于

是,我们满腔热忱,花了整整一年的功夫,投入这项工作,并以违背某个领导人的指示、冒险向人民出版社提供《郑超麟回忆录》手稿为代价,换取对方出版这套四卷本约二百多万字的资料书的承诺

但是,当《郑超麟回忆录》以内部发行十分畅销、我们陆续编出各卷初稿(第一卷已经根据责任编辑的要求几易其稿,最后得到其赞许而定稿)后,一是由于出版社责任编辑与总编辑在编辑方针上发生分歧;二是主管人民出版社的胡乔木对当时出版的《陈独秀文章选编》大加训斥;三是在清污运动中某个党史权威人士在全国新闻广播中公开宣称:“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平反”是史学界精神污染的第一大表现。这套十分珍贵的陈独秀史料书,竟然胎死腹中。出版社给每卷作者发了一点点可怜的赔偿费后,竟然把第一卷书稿扣在仓库里近达20年,至今仍不还给作者。当时学者的科研手段落后,没有“存盘”,因此也没有可能另找出版社。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套《陈独秀研究资料》惜未出版,但是,我在负责以上组织编辑、审阅初稿并执笔主编第四卷的过程中,对陈独秀一生的历史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再加上这个时期同时担任《人民日报》“学点革命史”、《中国报道》(对外的世界语杂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两个专栏系列文章的组织工作,编辑了《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一书,使我的科研工作能力,得到迅速提高,较快地完成了由教员到科研工作者的转变。

1979年底,我在查阅一些材料后,发现1938年1~2月康生连续发表在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武汉出版)上的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中,把陈独秀说成是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汉奸”,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予以推翻。于是,我就试着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问题》。因为这是一篇严重的

翻案文章,我又是初涉论坛,因此写出后不敢立即投搞,给在同室一起搞陈独秀研究的原在中宣部工作的老同志张君审阅,听听他的意见。他也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要慎重,放一放再说。同时,我又给另一个十分尊敬和信任的长者审阅,想听取他的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不料,半年多过去了,不见回音,而在某刊物上却出现了与我同样观点的文章。于是,我被深深刺痛,立即把此稿投出,很快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6期)上刊出。由于此刊在当时春寒料峭的复杂形势下,以敢冒风险、求真求实、发表新史料和新观点见长,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因此本文发表后,反响很大。这里我必须感谢当时该刊主编郭雄同志。他那开明大胆求实的办刊思想,与我的追求很投契,因此我俩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我早期几千字的文稿一般都在他那里发(因为该刊是内部发行的小刊物,太长的稿件不合适)。这为我后来撰写长篇论文和专著打下了基础。我在学术上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可以说与这个刊物(以及下面提到的《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据我所知,80年代,该刊培养了不少像我这样的学者。

1981年夏,我又完成一篇重要论文——《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把我编辑《陈独秀研究资料》第四卷的心得整理出来,篇幅竟达3.3万字,并大胆地向中国最高权威的历史期刊《历史研究》投稿。由于它第一次系统披露陈独秀后期资料,明确回答了学术界许多长期猜疑和争论不休的问题,特别是对陈独秀走上与托派相结合之路,开始是如何的勉强,之后二者又矛盾重重,最终不得不分裂的全过程,我用人们至今还不能容易看到的最原始的材料,叙述得清清楚楚。文章以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彻底推翻了视陈独秀与托派相结合就是“走向反革命”的传统观念。因此稿子一到杂志编辑部,还未刊出就引起轰动,并传扬开来。这篇文章刊于

1981年《历史研究》第6期。不少学者惊讶,惜字如金的《历史研究》会如此慷慨地给我这个初出茅庐之人刊出3.3万字篇幅的文章。两年后,在纪念该杂志社成立30周年而举行的该杂志1980~1983年优秀论文奖评选活动中,它与其他8篇文章一起获奖(本次评奖不分等级)。然后,杂志社请来上百位著名学者,举行了隆重的发奖仪式。这是我第一次获奖,也许是我一生中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奖项。这次评奖活动说是第一届,可是快20年过去了,还未见举行第二届。

1985年,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为陈独秀平反的舆论压力,胡耀邦总书记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了一篇题为《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的文章,后来发表在这年9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上,为陈独秀说了几句在当时来说相当不易的公道话。其中关于陈独秀后期历史的论述,主要根据我以上的文章。但是,为了避免太多“借鉴”嫌疑,增加“独立研究”的色彩,《为》文又有意采用一些其他资料,结果弄巧成拙,多处失实。例如关于中国托派的名称,我根据1931年5月1日至3日中国托派小组组织一大会通过并在当时印制的大会原始文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油印)和会后出版的机关报《火花》(油印)上发表的宣言署名,明白写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为》文却根据濮清泉1979年写的不正确的回忆,写成“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其实这个名称到1935年才使用。因为此前各国托派都遵照托洛茨基指示,只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内部斗争,是其内部的一个派,争取“夺权”和“改造”。所以中国托派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共产党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帮助其上台后,托洛茨基才对共产国际绝望,指示各国托派脱离共产党,独立筹备政党。中国托派由于一直受到镇压和破坏,直到1935年1月才开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对于诸如此类的几个史实性错

误,我当时就写更正表给他们,以免如此权威的文章以讹传讹。但是,恐怕为了保持他们的“尊严”,未予理睬。这大概是中国几千年“皇家史学”与“民间史学”不同的传统吧。

1987年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郑惠同志,遵照胡乔木同志的提议,到社会上呼吸新鲜空气,向我索稿。我首先向他提供了《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稿。该文主要根据陈独秀本人在大革命中发表的文章和他的性格特征,论述了共产国际指导大革命的路线虽然右倾,但陈独秀在执行中也有右倾化的理解。双方是各打50大板。现在看来,这是在没有看到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系统绝密档案资料的情况下,亦即没有了解莫斯科指导中国大革命路线的决策过程及在中国的具体执行情况的条件下一篇错误的文章。但是,却反映了我当时真实的认识,并客观上适应了当时胡乔木等人维护传统观念——大革命失败主要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需要。所以,文章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发表后,得到了胡乔木的赞扬,并在1991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举行的纪念建党70周年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奖评选中,获得一等奖。10年后,我看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才认识到这篇获奖文章的观点是多么肤浅。原来,陈独秀在大革命中写的那些错误文章,大都是他自己的主张被否定后,被迫违心而作的,因此,最后他被斯大林当作失败的替罪羊。于是,我不得不修正我原来的观点。

1981年《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发表,奠定了我撰写陈独秀后期历史的基础。当时以李新同志为首,与陈旭麓、孙思白、魏宏运、彭明、陈铁健等人组成编委会,正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一套“中国革命史丛书”,其中陈独秀传“上册”(1879~1927)首先被编委之一的任建树先生取走,取名为《陈独秀——从秀才到总书

记》，给我留下了“下册”，取名为《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本书的写作，为全面具体地展开论述陈独秀后期与共产党、国民党、中国托派及其他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宽敞的空间，揭开了层层人们未知的内幕。该书一方面从史料出发，肯定了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为寻找新的革命道路所作的可贵的探索，批驳所谓“反革命”、“汉奸”、“叛徒”等种种诬蔑；另一方面，由于受当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的政治思想形势的影响，在思想上评价陈独秀还没有放开。在某些问题上实际还没有理解陈独秀。如陈独秀晚年关于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一面说其对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总结苏、中两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有一点积极因素”，一面又认为陈独秀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在中国如果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面前，这样的社会主义连一天也存在不了”。即使如此，这部书在1984年完成后，出版社也一直没有敢出版，拖到1989年才与任建树撰写的“上传”一起面世。

由于这是大陆学者第一部史料最丰富、史实较真实、评价也较以前公平得多的“陈独秀传”，特别是根本否定了陈独秀后期历史的严重诬陷，因此，该书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1990年10月，获得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同时还十分畅销，到1997年1月已五次印刷，印数达25500册。据一位香港出版商说，一本学术著作，几年里能达到这样的印量，是相当惊人的。据上海图书馆统计，该书出版后，在该馆的借阅率一直名列前茅。而且在未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被多家网站搬上了网，红旗出版社更把它收进《家庭收藏集锦》光碟。

1984年以后，在我等待《陈独秀传》（下册）出版的日子里，我又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茂生老师合作，编写了《陈独秀年谱》，由

于林老师忙于教学工作,主要的编写工作由我承担,并在《陈传》出版前一年(1988)出版。1993年,我又应北京大学张岱年、季羨林教授之约,为《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新论语》编写《陈独秀语萃》,这使我有机会对陈独秀一生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写成“序言”——《陈独秀的学术思想》。

尽管如此,恢复陈独秀后期历史的本来面貌,还只是极少数人的认识。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他还是一个“反面人物”的形象,更谈不上恢复他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了。为了推动陈独秀研究更广泛深入的研究,1989年3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发起,联络北京、天津、上海、合肥、安庆等地陈独秀研究者,在北京市委党校召开了第一次陈独秀问题学术研讨会,会上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陈独秀研究会”,协商选举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茂生为会长,还有副会长,后来又增补我为秘书长(1997年改选陈铁健为会长,我为执行会长)。1992年2月,我们在陈独秀故乡安徽安庆市,联络安庆师范学院政教系等单位,召开了全国第二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为了改变一般学术研究会的工作仅仅停留在隔几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的状态,会员之间平时就应该及时交流讯息、新史料、新观点,才能有效推动陈独秀研究工作的深入,在这次研讨会后,我提议创办会刊,得到大家的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93年10月,由我主编的《陈独秀研究动态》创刊号诞生了。从此,我对陈独秀的研究工作,主要为办好这个刊物服务,最大的收获是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传统观念。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转折点是读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97年翻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丛书》(1920~1927)以后。该资料以大革命时期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一千多个系统的会议记录、报告、电报和文件,扎扎实实地告诉人们一个事实:从1922年共产国际确定国共合作方针开始,